



陳永正 主編

中國方術大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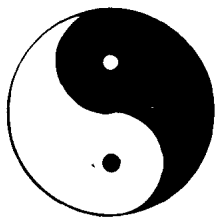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學出版社

古健青 張桂光
張錫民 陳永正
編



200312802

中國方術大辭典^甲



中山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权
封面设计 方楚娟
绘 图 刘叔伦
责任技编 徐镜昌
责任校对 钟永源
校 对 徐镜昌
郑伟贞
廖潮钦

中国方术大辞典

陈永正 主编

古健青 张桂光 编
张解民 陈永正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116.2万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35000册

登记证号(粤)第11号

ISBN7-306-00313-5

7·8 定价: 28.00元

参与本辞典编纂的工作人员

主要撰稿	古健青	张桂光
	张解民	陈永正
撰稿	张涛光	张炳光
编务、资料	陈建	陈永滔
	杨惠荣	黄锦儿
目录、索引	于曼玲	

本辞典经下列先生审阅(按姓氏笔画为序)

- 王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荣芳教授
张振林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宪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國方術大辭典

王季思



编写说明

本辞典是一部有关中国方术的专科辞典。

本辞典的编纂，旨在介绍中国方术的基本知识，为我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专门的工具，以供科学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及文化工作者参考。

本辞典由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组织编写，陈永正担任主编。其中方术一般、人物、著作部分，由古健青、陈永正编写；甲骨卜、易占、星占、象占、梦占、杂占部分，由张桂光编写；太乙、六壬、奇门遁甲、择吉、星命部分，由陈永正编写；相术、堪舆部分，由张解民编写；外丹、内丹、气功养生、服食、辟谷、房中术、杂术、符咒、巫术部分，由古健青编写。张涛光编写了有关自然科学的条目三百余条，陈永正在全书各部分都编写了一些条目。词目表和索引由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资料室于曼玲编定。参加具体编务工作的还有张炳光、杨惠荣、陈永滔、陈建、黄锦儿等。

本辞典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广州市中医中药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也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资料，又蒙中山大学出版社庄昭、刘翰飞、陈必胜、杨权等先生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辞典在选词和释义方面，缺点错误定当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凡 例

一、本辞典共收条目 6393 条。包括方术一般、甲骨卜、易占、象占、梦占、星占、太乙、六壬、奇门遁甲、杂占、相术、堪舆、择吉、星命、外丹、内丹、气功养生、服食、辟谷、房中术、符咒、巫术、杂术、人物、著作等二十五类。有些条目的内容往往涉及上述分类中的两三类，甚至几类，这种条目按其内容的主要方面归类。

二、方术的含义，古今有异，收词范围不易确定，本书所收条目，大抵以见于古代有关文献者为据。

三、条目的组成，包括释义和书证。释义只作客观的简明的叙述，一般不加判断语言。书证绝大部分引自原著，一时不易找到原著者则转引自其他书籍，书证均注明出处。

四、一词多义的条目用①②③④分项解释，但以属于中国方术的义项为限。

五、本辞典内容按类编排。条目按第一个字的笔画数编排；笔画数相同的，以起笔笔形 一 | 丿 \ <（包括各种折笔）的顺序排列；第一字相同的，按第二字的笔画数和起笔笔形排列。

六、内容相近的条目，只在一条下详加解释，其他条目从略。

七、历史纪年，用历代帝王年号，并夹注公历纪年。

八、书前有分类辞目表，书末有笔画总目表，并附有中国方术大事年表，供参考和检索。

序

提起“方术”，很多人都觉得陌生，不知是一门什么学问；又有人以为它神秘莫测，不是一般人能够窥探的；也有人说，“方术”全是骗术，毫无可取，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要不得的糟粕，理应归入扫荡之列。

我却不是这样想，我认为，“方术”既不全是神秘，也非全是糟粕，“方术”乃是古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愚昧编织成的一张网。

没有智慧，古人就编不出这样丰富多采、五花八门的“方术”来，而且具有如此长久的魅力。而另一方面，没有愚昧，古人就不会让“方术”把正确与谬误搅得如此一塌糊涂，乃至产生许多祸害；就不会让它泛滥得如此广远，乃至延续数千年之久。

从古以来，没有多少人不曾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方术”的影响，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全脱出它的思想笼罩。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伴影，曾经严重地影响着、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自帝王、下至贩夫走卒，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近过它，受过它的摆布。许多骗子借它横行无忌，坑害过不知多少人，使人虚掷了不知多少财富。然而，思想家和科学家又在研究它的同时在发展天文学、医学、化学和人体探讨等方面取得过若干成绩或成就；政治家以其术辅助统治，文学家借其题进行创作，军事家想利用它克敌制胜，起义者利用它号召群众，宗教家利用它吸引信徒。可见“方术”神通广大，无孔不入！直到现在，“方术”还没有绝迹，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方术”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它起于远古，成于两汉。它所包含的内容，则随时代而不同，正象一个雪球，伴随历史长河的流淌而越滚越大。开头是原始的，越到后来，它的形式便越多样，制作便越精细，手段也越巧妙。

“方术”固然以繁复驳杂的姿态呈现，不过归纳起来，也无非是几个部类：

最早出现的骨卜、甲卜(殷、周的甲骨卜辞是其遗文),稍后出现的蓍卜、筮筮、星占、解梦,以及后起的杯筮卜、金钱卜、灵鸟卜、测字、卦影、圆光等等,属于解决疑难、解释怪异现象、决定行为趋向的,都可归入预测术。

看相、算命、择日、看风水等等,虽然手段不同,形式有别,也都可以归入预测术。

另一个部类是长生久视之术。它是人类发现自己也有主观能动作用之后才兴起来的。比之甲卜、骨卜等完全匍伏于大自然和鬼神脚下的占卜术,它属于后起。主要有外丹术、内丹术、气功养生、服食、辟谷、房中术等。它强调人的行为可以同大自然抗衡,替人在大自然中争夺存在的位置。它起于战国和秦代,盛于汉、唐。其中某些手段至今还为人所信奉,而其理论至今还在探索之中。

不属于上述两大类的,则还有许多杂术。例如佛教的所谓陀罗尼,又称密语、秘密咒。据说有消灾徼福、防避邪害的作用,虽非土生土长,而久已为中国人所信奉。又如道士使用的符箓和咒语,据说有劾召鬼神、镇邪驱鬼、治病救灾的本事。此外又有所谓巫蛊,又称魇魔,术者或用符咒,或用实物,欲伤害敌人,禁制对手。其来源甚古,又都带有防御与进攻的意念,与消极的预测未来和积极的养生保命之术又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方术形式多样,深入社会腠理,干预着人们生活的一切。

方术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一时代的人制造的,而是出自历代许许多多不知来历、不明身份、各不相谋、各具神通的人物之手。若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它正似一张断烂零碎、无纲无维的破网。它的材料散布在数以万计的古籍文献、公私文物及其他载体之中,包括经、史、子、集、志、说、佛藏、道藏、碑刻崖凿、民间手钞乃至口头秘传、师弟私授,可谓无处不有,收集起来,是一件极其费事的工作。《古今图书集成》中《博物汇编》曾收录了一部分,不过既无系统,又不齐全。大抵历来的学者都把“方术”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旁门左道,因而对之采取回避或漠视的态度,这自然是一孔之见。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研究

希腊神话早已是一门大学问，在世界很多地方，研究民族传统、远古巫术、民间习俗、魔怪现象，全都是专门学问。中国“方术”所涉的范围之广，所包含的内容之丰富，所产生的影响之大，都远非其他民族的巫术、魔幻、神话、民俗所能及。若说中国“方术”有许多糟粕，那也是事实，不过在糟粕之外，仍有精华。近年风起云涌地研究的气功，本来起源于“方术”；特异功能问题虽然还有争议，但不能把它排除于研究之外，则已成定论；研究梦，从弗洛伊德开始便归入于心理学；对《易》数进行科学探讨，近年更是方兴未艾。它们本都属于“方术”。可见“方术”也藏有合理的内核。在林林总总的各种“方术”之中，还可以看出古人如何与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威力进行斗争，如求雨驱旱；如何对想象中的天命、天意、天理尝试角胜，如施法以趋吉避凶；如何从抗御大自然中发现人自己的能动作用，如探讨长生久视、气功之术；如何与幻想中的各种敌害进行较量；如何从绝望之中找寻希望，从痛苦之中取得安慰；乃至如何企图以主观力量影响客观、改变客观等等。所有这些，都有极丰富的内容。

当然，在古人这种种施为之中，难免有许多谬误。它借助于虚幻的神灵，寄望于无知的卜筮，把虚妄的幻象视为真实，把悖理的愚昧视为正常；甚焉者，使用残忍邪恶的手段，破坏性的行为，以求达到私己的目的，这一切都曾引致极可怕的后果，造成极大的精神和物质破坏，使千千万万善良无辜的人陷入痛苦悲惨的境地。这也是同样需要正视的。

由于中国学术界对这种既智慧也愚昧的“方术”一向不甚理睬，任其自生自灭，因此科学研究的成果甚少。试看自《汉书·艺文志》以来所记录的“方术”典籍严重丧失，便可知研究“方术”人才之寥落。有些学者，碰到“方术”语词，常会弄出错误。不妨举几例：

中华书局校点本《南齐书·高帝纪论》：“主人与客俱得吉，计先举事者胜。”将“吉计”分逗，不知“吉计”即吉课，是太乙占中的术语。

北京大学校注本《论衡》，把“飞尸流凶”解为“会飞的尸体，行走的凶怪”，而不知“飞尸”是丛辰之名。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把“伏吟”解为“占卜吉凶时所得卦爻之象”，把“反吟”解为“以人的生辰八字，附会人事，推其吉凶祸福及婚姻成败”，而不知反吟和伏吟原指用“式”占卜时天盘和地盘显示出的某种关系。

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化大全》第四册的“术数”章，举出四个主要神煞进行解释时，把“暗金的煞”改为“暗金之煞”，误以为“的”是助词。

《辞源》释“七损八益”，以为“中医以七指女，八指男”。但据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七损是七种有害健康的房事，八益则为八种有益健康的房术。

可见在中国学术界中，“方术”的研究确实是个弱门。今天很有必要扭转这种局面。

由此我想到，广东几位中青年学者编撰这本《中国方术大辞典》，很可以成为这一研究事业的一个可喜的开端。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由于可以借手的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事必须从头做起，这就要求编者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其次，由于资料零碎分散，这又要求编者必须有探幽索隐、不厌其烦的毅力与精神。再则数量庞大的专词术语，大多数没有权威性的解释，更有不少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又要求编者必须以科学态度缜密思考，定其义以解其纷。这项工作艰巨的，当然，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本人对“方术”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因平时涉猎所及，深觉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大，对中国社会发展牵涉甚广；它所产生的正负面作用，都深深地镌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现实之中。因此不但学术界对之不能忽视；每一个对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给予注意或负有责任的人，对其影响也不可以不留意。现在，《中国方术大辞典》有机会问世，将有助于推动“方术”研究，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我感到高兴，因而也乐意为它作序。

刘逸生

1989年5月于广州

中国的方术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方术。

“方术”，在先秦时本指道术而言。《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这里的方术，是指某些特定的学问，即所谓“治道艺术”。自秦代以还，方术专指方士之术，几乎成了一切非理性的神秘之术的总称，并分出“方技”和“术数”两大类。《汉书·艺文志》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术列为“方技”，把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术列为“术数”。后来“方术”、“方技”、“术数”三者逐渐混淆。《后汉书》有《方术传》，其序把卜筮、阴阳推步之学、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列入方术，并云“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等。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五《方术部》，包括“养生”、“卜筮”、“相”、“疾”、“医”等。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二〇至七三七《方术部》，包括“养生”、“医”、“卜”、“诸卜”、“筮”、“相”、“占候”、“占星”、“占风”、“占雨”、“望气”、“巫”、“厌蛊”、“祝”、“符”、“术”、“禁”、“幻”等。

今天我们总结古代方术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预测术，二、长生术，三、杂术。

预测术，主要包括占卜术和星相术。

占卜术，是用各种非理性的、神秘的方法，来获得世间事物的情报或预测未来吉凶祸福之术。它的哲学基础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界

和人类的最基本的认识，表达了人们对神的敬畏及期望获得神示的迫切心情。现存可考的最早的占卜术为甲骨卜。考古发掘表明，在新石器时期已广泛使用卜骨，至商代甲骨卜臻于极盛。它的特点是以火烧灼兽骨龟甲，观其兆象以断吉凶。周代，以数理为依据的筮占法流行，并出现了著占专书《易经》。以阴爻和阳爻组成八卦及六十四卦进行占验，表明了古人对天人、阴阳关系的理解。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星占术，也在殷周时期盛行，人们利用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行情况的变化来预测国家的重大事件。除了甲骨卜、筮占、星占外，先秦时还有筮筮、梦占以及其他各种象占的占卜术。汉以后，更衍化出杯筮、金钱卜、灵棋占、牙牌数、签占等林林总总占卜术来。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历法的推究结合起来，产生了两种特殊的占卜术：择吉术和式卜术。择吉术，也叫选择术或择日术。战国至秦汉时期，选择日辰之风甚盛，择吉的家数甚多。《史记·日者列传》中就曾记载过由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一家等就择日问题进行的一次辩论。式卜术，包括六壬、太乙、遁甲三种，合称“三式”，其特点是运用“式”这种器具进行占卜。

星相术，包括星命术和相人术、相地术。星命术，是根据星占术或人出生时的生辰八字推算个人命运之术，主要有“五星术”和“三命术”两大流派。相人术，是观察人的形体、相貌以测断其贵贱寿夭、吉凶福祸之术。相地术，则包括相宅术和相墓术，统称为堪舆术或风水术。是观察宅舍、坟墓的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之术。《汉书·艺文志》把相人术和相地术都列入“形法”之学。

以上所说的预测术，大致可纳入《汉书·艺文志》中的“术数”范围。

长生术。这里是指广义的延长寿命的方术。包括有医术、养生术以及神仙术等。后世医术从方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其他长生术，则被道教继承下来，成为一套有系统的道教神仙术。

长生术，主要有外丹术、内丹术、气功养生术、服食、辟谷、房中术等。

外丹术，也称“金丹之术”或“黄白术”。始于战国秦汉而盛于南北朝、隋唐。术者以丹砂、铅等为原料，放在炉鼎中烧炼，制成仙丹。据

称服之可延年益寿甚至羽化成仙。内丹术是与外丹术相对而言的，它是道教修炼的方术之一，通过静坐、吐纳等手段，使精、气、神凝聚于体内，成为内丹，可却病延年，长生不老。气功养生术则包括古代的行气、吐纳、导引、存思、胎息等方术，其来源甚古，屡见于先秦典籍中，后世更与道家和神仙家思想结合起来，成为人们防病摄生的重要手段。服食是通过服用各种药物，以求却病延年。辟谷，则指在修炼期间不食五谷，以求长寿。房中术是专门研究男女性生活的学问，在战国时与行气、服食并列为当时方术的三个主要流派。

以上所说的长生术，大致可纳入《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范围。

至于杂术，则包括内容庞杂的各种方术。如远古的巫术以及后世道教的法术。这些杂术多与鬼神有关，如祈禳禁咒、召劾鬼神之类，还有一些是流行在民间的杂术，其中有类似现代所谓“特异功能”的奇方异术。

下边就方术的主要内容分别作具体的介绍。

甲骨卜

甲骨卜是指以烧灼龟甲或兽骨所得兆象预测吉凶的一种占卜方法。我国甲骨卜的起源甚早，新石器时期即已在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山东、山西、甘肃、四川、江苏等大片土地上流行。早期占卜全用直灼，无钻凿；只用骨，不用甲。灼痕密集而无规则，取材以羊胛骨为主，其次是牛胛骨，还有猪骨和鹿骨等。牛胛骨之上升为主要卜用材料以及龟甲之开始用于占卜，都是钻凿发明，具备使骨料变薄的手段之后的事情。典籍只言龟卜，不记骨卜，实属严重的遗漏。

殷墟晚商文化期是甲骨卜的极盛时期，占卜之受重视以及占卜技术之考究，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甲骨的征集、审定、攻治到钻凿、灼兆、刻辞，均有一套严密的制度。卜用背甲及改制背甲，刻兆与涂辞，一事十八卜以及甲桥刻辞、骨白刻辞等等，均为史籍所未闻；钻、凿、钻凿兼施以及卜兆墨拆纵横之具体形象，贞卜记录的前辞、问辞、占辞、验辞之完整结构等等，亦为史载所未详；贞指训问还是训正，契指灼还是指钻凿，灼是否必于钻中等等，亦为前人所争论不休。凡此种种，都赖殷墟甲骨之出土而得到解决，本书的有关辞条，即以殷墟甲骨为据。

周原甲骨钻凿兼施，排列整齐，卜辞字体纤细，与殷末第五期的风格接近，表现出周卜与殷卜间的继承关系。但殷人常用的长凿旁有圆钻形式不见于周原卜骨，周甲常用的方凿不见于殷墟；殷墟甲骨纪时用干支，周原甲骨纪时用月相；周原甲骨文每需五倍放大镜才能辨识，亦远非殷墟五期小字所能企及等等，则又表明了周卜与殷卜不同的特色。此外，周人尚有食墨卜法，为周公卜洛所用，《周礼》亦有致其墨之说，似未宜据殷墟、周原之甲骨非其法而轻易予以否定。《周礼》所记为理想之周制，虽不尽可靠，但与出土实物相印证，实相去不远，显有所据。

秦卜史籍未详。《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当为汉代龟卜制度。从选龟、杀龟、拔龟、钻龟、灼兆到各类卜事之祝辞、兆象判断以及各种兆象于不同卜事由所主之不同吉凶等等，均有详细记述，是我们研究汉卜的重要依据。

《隋书》、《唐书》、《宋史》之《艺文志》俱有关于龟卜书籍的记载，但均已遗佚。明清以来龟卜所据，主要是旧传的《龟经》及记录吴中俗卜的《玉灵秘本》。大抵据《史记·龟策列传》而又加改造，于选龟、攻龟、灼契、占龟诸法，均有记述，但较殷周古法，相去已远。

此外，唐以来有卜用生龟之法，蒙古等少数民族亦有以胛骨卦象占吉凶的，大凡非经烧灼甲骨求兆的，我们都列入杂卜。

易占

易占是指与现存最古筮书《周易》筮法类型相同的占筮方法。按《易·系辞》记载，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的伏羲时代，即使以出土实物为据，其产生亦起码在晚商以前。殷墟晚商文化遗址及山东平阴朱家桥商末墓葬出土物上的筮数符号表明，占筮之法不仅在商朝广大区域内流行，而且就水平言，亦已达到使用重卦的程度。典籍所记《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看来是有根据的，过去对殷人是否懂得用筮的怀疑，显然缺乏道理。当然，由于未见更详细的记录，我们对殷易筮仍未明了，还须做进一步研究，希望有新材料出土。

《三易》中被使用得最充分并能流传至今的，是《周易》。周为农业部落，奉行植物崇拜，其筮用蓍是没有疑问的。但周初甲骨、铜器都

仅记筮数，《易经》只记卦爻辞，《左传》、《国语》只记筮例，于筮法均无记载。向被视为传统筮法的《易·系辞》大衍法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从周初甲骨、铜器上的筮数看，所用数字为一、五、六、七、八，与仅用七、八、九、六的大衍法显然是有区别的。由于马王堆帛书《易·系辞》无“大衍法”一段，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大衍法”可能是西汉中期的产物。《周易》在西汉备受重视，被尊为六经之首，易学空前高涨，对《周易》的解说成为专门的学问，易占之术越衍越繁，于互体、卦变之外，更有纳甲、八宫、五行、世应、爻辰、卦气、交感等等，已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宋、清两代虽均有易学的高潮时期，但实际上都未能超出汉易的范畴，后世易占之术，主要是沿袭汉易而来的，我们所收的易学术语，主要的也是汉易的术语。

一些商周铜器上的卦画与《太玄》中某些卦形的吻合或近似表明，太玄筮法可能是曾与《易》筮并行的商周古法。但由于《太玄》与《易》同为蓍筮，同经挂一、分二、过揲、归扚等过程而求数定吉凶，其为同一占筮类型是十分显明的。宋司马光仿《太玄》而作的《潜虚》筮法，蔡沈模仿《潜虚》而作的《洪范皇极》筮法等等，虽称另开占筮法门，我们还是将它归入易占范畴。

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为中古时拟《易》而作的筮书，尽管其筮法可能来源甚古，但总体仍属易筮类型，我们也将它收入易占范围。

此外，唐以后有不少简化《易》筮方法的作法，在卜肆中最为流行，其仍以《周易》为释卦依据的，我们仍将之归入易占；筮法改变而又另立卦辞的，虽可视为易占支流，我们将其归入杂占。

象占、梦占

象占是指根据事物表现出来的特异现象去推测未来之吉凶的一种方术。象占与龟卜、蓍筮及羊卜、筮卜等卜筮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卜筮都是事有疑难而设法求决于神灵，有明显的人为性质，而象占则是事物有了某种特异表现之后，人们才据以推测其未来，主要依赖于客观事物的启示。初民驾驭自然的能力极弱，将人事的吉凶祸福与事物的特异表现联系起来，是他们了解未来的最原始形式，卜筮实际上

是为补象占的不足而产生的。象占有着比卜筮更长的历史，它的起源应该比卜筮早很多很多。

我国象占产生的具体时间及其原始形态，由于材料缺乏，我们无法断定。从《山海经》对“可以考禎祥变怪之物”的记载看，除了怪异形象的描写外，就只有“见则其邑大旱”、“见则其国大疫”、“见则其国大穰”一类简单的占验记录，可以想见，早期的象占主要凭直觉经验，能够引起联想的，一般都是造成印象极深的大怪异，以及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大事情，而且联想都比较直观。

见于《周易》、《尚书》、《左传》等典籍的殷周象占，已经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桑谷生于朝、六鹤退飞、鸛鸽来巢以及“舆脱辐，夫妻反目”、“鼎革耳，其行塞”等等，占验的对象已经从怪异事物发展为常见事物之怪异现象，联系的人事，亦已从水、旱、兵、疫等大事发展为具体人物的某些具体事情，而占验的方法，亦已由直觉的观察发展为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识，并且有了客观事物与人事之间的生动比象了。

但是，象占的极盛时期，还推两汉。经京房、董仲舒、刘向等人的阐发与提倡，象占之受重视以及象占理论之完善，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占验的对象越来越广泛，联系的人事越来越细致。至于占验的方法，由于与易占、五行等学说相配合，加入了很多人为的成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汉书·五行志》所载的各类征兆，材料之丰富，阐释之入微，体系之完备，均为前所未有的。尽管后世对象占亦颇重视，但后出史书之《五行志》、《符瑞志》之类，实际都未能出其范围，仅可作其材料之补充而已。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梦占。“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梦占乃是象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梦中所见的兆象预测人事吉凶的，梦象与一般物象既有相同的地方，亦有独自的特点，所以古人占梦有一套独特的理论。

本书象占部分所收录的词条，一般都是一个独立的具体征兆。在象占发展过程中，有些征兆被人们按不同时、地赋予不同内容，形成一整套占验方法，已经不是普通的简单征兆。这类情形，我们一般归入“杂占”部分。